

# 《景岳全书》以阴阳为本论治汗证

王小芳,韩新民

(南京中医药大学,江苏 南京 210029)

**[摘要]**明代医家张景岳在《景岳全书》中对汗证的阐述系统全面,其论治汗证时均以阴阳为本,并提出查脉证有火无火辨汗证阴阳。其指出自汗、盗汗各有阴阳,尤应重视阴汗的存在;战汗之难出者为病态,为阴证,需培补元气助汗出病愈;头汗亦分阴阳两证,即邪热上壅之阳证和阳气内脱之阴证,应分辨阴阳论治;小儿汗证应识常与变,重视汗出过多之变及病情之变,而辨阴阳论治。张景岳对汗证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治疗汗证的理论和方法,对当今临床诊治汗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
**[关键词]**景岳全书;张景岳;阴阳;汗证

**[中图分类号]**R2-52 **[DOI]**10.3969/j.issn.2095-7246.2019.04.004

汗证是指由于阴阳失调,腠理不固,而致汗液外泄失常的病证<sup>[1]</sup>。中医对于汗证的认识较早,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即论及多汗、寝汗、灌汗、绝汗等汗出异常

**作者简介:**王小芳(1993-),女,硕士研究生

**通信作者:**韩新民(1957-),男,教授,主任中医师,博士生导师, [hxmlnj@163.com](mailto:hxmlnj@163.com)

之汗证。关于盗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《金匱要略》中,并指出虚劳多为盗汗之因,《伤寒论》中亦多次提及战汗、头汗等证。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<sup>[2]</sup>：“无论昏醒,浸浸自出者,名曰自汗;或睡着汗出,即名盗汗,或云寝汗”,对自汗、盗汗进行鉴别。朱丹溪出自汗病因多属气虚、血虚、湿、阳虚、痰,盗汗病因多

编,1920年,现存有1920年抄本,藏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。”<sup>[3]101</sup> 笔者从国家图书馆(中国历史文献总库·民国图书数据库)中发现《伤寒心悟》电子版。书中可见民国丁巳年(1917年)陈玉海藻序,可知此书成书年代并非出版年(1920年),应当为1917年以前。而《总目》记载“1920年”有误。

2.2.4 《最新伤寒问答》《总目》：“《最新伤寒问答》，萧屏撰，1923年，现存有1923年无锡锡成印刷公司铅印本。”<sup>[3]101</sup> 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版本末尾印有民国五年(1916年)出版，民国十二年(1923年)再版。由此可知该书应当完成于民国五年(1916年)之前，而《总目》记载该书成于“1923年”有误。

2.2.5 《伤寒论改正并注》《总目》：“《伤寒论改正并注》，陈逊斋撰，1935年，现存有1935年著者铅印本。”<sup>[3]75</sup> 国家图书馆(中国历史文献总库·民国图书数据库)有《伤寒论改正并注》电子版，书中可见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陈逊斋序，书中末尾有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出版。由此可知，该书成书年代应当在1934年以前。《总目》中记载的“1935年”有误。

2.2.6 《伤寒折中》《总目》：“《伤寒折中》，欧阳逸休编，1942年，现存有1942年铅印本。”<sup>[3]76</sup> 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版本中有民国辛巳年(1941年)欧阳逸休自序，说明该书于1941年之前就已经完成。故可

知《总目》记载的“1942年”有误。

2.3 归类问题 《总目》：“《伤寒论霍乱训解》(附章太炎霍乱论评注)，刘复撰，1931、1940年中国古医学会铅印本。”<sup>[3]507</sup> 《总目》将其归为临证各科类。笔者从国家图书馆(中国历史文献总库·民国图书数据库)发现1940年出版的《伤寒论霍乱训解》，全书内容都是围绕《金匱要略·辨霍乱病脉证并治》一章进行阐述，包含有张仲景原文以及方剂等。《总目》应当将其归入伤寒金匱类中，可改。

综上所述，《总目》对民国伤寒文献的收录、归类、书籍的著录信息以及藏书地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。而《总目》作为研究中医文献的重要工具书，其准确性与全面性对研究中医文献学者尤为重要。笔者所补充之内容，致力于完善《总目》，以期最大限度地为学术界展现民国伤寒的现存书籍信息，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。

**参考文献:**

- [1] 杨克卫,李芃柳,王朝辉,等.《中国中医古籍总目》未载民国针灸文献述略[J]. 中医药文化,2017,12(1):13-17.
- [2] 裘沛然. 中国医籍大辞典:上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2.
- [3] 薛清录.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[M]. 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.

(收稿日期:2019-04-18;编辑:张倩)

属血虚、阴虚。张景岳则在总结前人对汗证的论治基础上,结合自身临床经验,阐述了其对自汗、盗汗、战汗、头汗、小儿汗证等汗证的认识。现试从《景岳全书》有关内容探讨张景岳对汗证的认识与治疗规律。

## 1 自汗、盗汗

1.1 自汗、盗汗分阴阳,尤重识阴汗 张景岳在对汗证的论述中首列《黄帝内经》中经典条文,以经义开篇,而后论述其对汗证的认识。汗证以汗出时间分为自汗、盗汗,自汗无分其时、动则汗甚,盗汗寐时汗出、醒则汗止,论述古法“自汗属阳虚,盗汗属阴虚”之常见病机,提出“自汗亦有阴虚,盗汗亦多阳虚”观点,并进行具体论述:自汗之人,亦有饮食、劳倦、酒色之火伤胃、脾、肾,出现阳胜阴衰之证而自汗出,此为自汗之阴虚证。盗汗之人,亦有无火之证,寐时卫气入于内,表虚于日间,故可出现无阴虚之盗汗,此为盗汗之阳虚证。针对自汗、盗汗各有阴阳,提出本于阴阳的辨证方法——但察有火无火。“阳加于阴,谓之汗”,历代对于阳汗的认识较为普遍,对阴汗的认识较少。张景岳提出寒亦能致汗,且阳虚内寒为阴汗的重要病机,在内之阳衰弱,难以主持固守津液,出现汗出无火之阴证。故张景岳认为自汗、盗汗各分阴阳,尤应重视阴汗的存在。

1.2 自汗、盗汗辨阴阳而治 张景岳根据“但查有火无火”辨证方法分别治疗自汗、盗汗。对于脉证有火者,均以阳证论治:阳盛阴虚兼有者,辨别两者甚微施治;阴虚火甚者,取当归六黄汤或保阴煎等;阴虚火微者,取一阴煎或加减一阴煎等;心火不宁者,取朱砂安神丸、天王补心丹或生脉散等。独有阳盛导致血热汗出者,取正气汤、黄芩芍药汤或清化饮等。对于脉证无火者,均以阴证论治:阳气未衰者,取三阴煎、参归汤、人参建中汤等;其中盗汗为主者,取参苓散、独参汤等;卫虚而汗者,取黄芪六一汤、玉屏风散等;阳气虚衰微者,取参附汤、大建中汤等;阳气虚衰甚者,取大补元煎、六味回阳饮等。张景岳强调阴证病机以气虚为根,用药尤其需顾护阳气。对于因医家过汗导致的气虚汗出者,治疗亦以阴证处之,辨气虚微甚而分别治之:气虚微者,阳气尚存,取三阴煎、五阴煎、独参汤等;气虚甚者,阳气亦虚,取大补元煎、六味回阳饮等。

## 2 战汗阴证为主,补虚而愈

张景岳于《景岳全书·战汗》中,首列《伤寒论》中对战汗的论述析战汗之原,提出战汗为阴证,见于本虚之中的虚不甚者。表证当以汗出而解,正气内实则正气驱邪外出,无需“作战”,而本虚之人正气不

足,难以径直驱邪,邪正交争,正胜则汗出而向愈。战汗为正邪交争激烈的一种现象,战汗一出,尚表明正能胜邪,可能“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,出现“汗出持续”之象,仍无需忧虑,最恐出现“栗不战,竟成寒逆者,多不可救”。张景岳以战、栗辨病情,“邪正之争于外者则为战,战其愈者也;邪正之争于内者则为栗,栗其甚者也”,并提出对于正虚难以战汗而愈者,予大补温热之剂及艾灼回阳等法助正驱邪,助其汗出而愈。后附大补元气治正虚寒栗验案1则,指出“汗之出与汗之收,皆元气为之枢机耳”“合辟之权,不在乎能放能收,而在乎所以主之者”<sup>[3]</sup>。正如姚洁琼等<sup>[4]</sup>评析该医案时,指出张景岳灵活运用补气固阳之法发汗、收汗,做到了“发汗用此,而收汗复用此”,体现了其论治汗证重视“元气”,补气固阳以治汗证的学术思想。

## 3 头汗分阴阳论治

张景岳将头汗分为阴阳两证——邪热上壅的阳证,阳气内脱的阴证。头汗之阳证为伤寒变证,伤寒本应遍身得汗而解,若未能遍身汗出,则热蒸于上,出现头汗出,此为阳证,可通过清法、散法、下法除上蒸之热,则头汗自解。而头汗之阴证,则是由于失治、误治或病情进展,导致阴液内竭、小水不通,阳气上脱、头汗明显,为病情危重之象。张景岳结合《伤寒论》《脉经》等经典论述及自身临床经验,总结提出应根据阴阳、邪实、正虚差异辨治头汗。阳证依邪实性质不同分别论治:表邪所致头汗,脉紧数,治之宜散,方选小柴胡汤、柴胡桂枝干姜汤、新方诸柴胡饮等;火邪所致头汗,脉洪滑,烦热,治之宜清,方选人参白虎汤、益元散等;水结胸中所致头汗,心下痞满,治之宜泻,方选大陷胸汤、小半夏茯苓汤等;便结所致头汗,腹胀疼痛,治之宜下,方选承气汤等。阴证则以虚证为主,且病情危重,诸虚泄泻,阳脱头汗者,宜急救之,方选独参汤、大补元煎、六味回阳饮等。

## 4 小儿汗证分阴阳论治

小儿汗证历代论述较多,由气血不足、元气未充、腠理不密所致,其多于饮食、衣被过热之时作。《婴童类萃》<sup>[5]</sup>曰:“有乳母壮盛,婴儿体实,睡中汗出,不拘日夜,时常汗多,无妨,不必服。”《幼科发挥》<sup>[6]</sup>云:“汗者心之液也,唯头汗不必治。小儿纯阳之体,头者诸阳之会,心属火,头汗者,炎上之象也。故头汗者,乃清阳发越之象,不必治也。”张景岳提出,汗出过多的小儿亦不能单纯以常态论,应属气虚不固之证,且汗出日久亦有加重营卫气血亏虚之弊,甚而衰羸之相可显。对于小儿汗证的治疗,其提出幼时见汗出过多之证,即予培补,可建他日身强之

基。李国芳等<sup>[7]</sup>对小儿汗证的古代文献研究结果亦表明,小儿汗证为阴阳违和所致,以虚证为多,如机体气血调和、阴平阳秘则自然不病。具体治疗上,张景岳强调应辨别阴阳施治,无火之阴证,辨证之微甚分别补之。微者,予团参散、参苓散、四君子汤、无味异功散、白术散等;甚者,予三阴煎、人参养营汤、十全大补汤等。而有火之阳证,辨热之不同分别治之:心经有火,汗出烦渴者,予生脉散、一阴煎;肝脾火盛,汗出脉洪滑、烦热明显者,予当归六黄汤、加减一阴煎等;阳明热甚,汗出大渴者,予竹叶石膏汤。小儿汗证之变证,则需谨慎识别治之:失治误治致气虚气脱、大汗亡阳之证,予参附汤、六味回阳饮、芪附汤等急救之;汗出亡阳,阴虚血燥,出现角弓反张、颈项强直等证,予大营煎、人参养营汤、十全大补汤等补虚,万不可以风论治。并以其儿辈汗出治疗之经验,提出人参煎汤培补止汗之常法。

## 5 其他汗证

除自汗、盗汗、战汗、头汗、小儿盗汗等以汗出症状命名的常见汗证,张景岳论述汗证之时亦兼论湿汗及病后汗出之证,具体如下:

湿汗证见汗出,身重困倦,脉缓大,声音如从瓮中出者。湿汗亦以阴阳分辨,湿热、寒湿致汗分属阳证、阴证而治之:湿热之阳证,则去其火而湿自除,依前阳证之法论治;寒湿之阴证则助其火而除湿,依前阳证之法论治。或以健脾除湿之法,取玉屏风散、四君子汤、五君子煎等方,使脾健水运而湿去汗收。

病后汗出需析病情之轻重、汗证之阴阳。临证需根据患者病之外感、内伤及汗出情况辨汗之宜否。外感病后邪气初解而汗出不止者,即使汗出数日旬日亦属愈兆,究此为“汗之宜”,为阳证,为表证汗出而解后腠理开泄、卫气尚虚之证,汗将随卫气充实而渐止。内伤杂症之汗出者,为“汗之非宜”,为阴证,需引起医家重视,应治内伤杂症之原,而非止汗之标。

## 6 汗证治法之补充

6.1 汗出不治之证 张景岳指出6条汗证危重证候,其分别为“汗出而喘甚、汗出而脉脱、汗出而身痛甚、汗出发润至颠、汗出如油、汗出如珠”。此6条均为汗出之危证、重证,可达亡阴、亡阳之证。张景岳

提出汗证中此等危重征象,提醒医者“凡见此类,不得妄为用药”,以免犯虚虚实实之错。

6.2 止汗药物的选择 张景岳在汗证的论治中,所选诸方多为临床常用之方,辨证对因治疗而达汗止病愈之功,但其对于麻黄根、浮小麦、乌梅、五味子、黑豆、龙骨、牡蛎等收汗止汗之品,并无排斥,论可随宜择用,并举唾津调五倍子粉填脐止汗之法等。张欣等<sup>[8]</sup>对五倍子脐贴治疗小儿汗证的研究亦显示其具有确切的临床疗效。故止汗药物于临证之时,可酌情选用。

## 7 讨论

汗证为临床常见病证,可出现多种症状,如自汗、盗汗、战汗、头汗。张景岳以阴阳为本论治汗证,并提出但查脉证有火无火之法辨别阴阳而分别处之。其认为不同汗证阴阳亦有偏颇,证治亦有差异,并以阴阳为本为证治基础,具体论述不同汗证的辨证论治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:“善诊者,查色按脉,先别阴阳。”张景岳对汗证证治的论述正是对中医证治以阴阳为本的具体阐明,不仅为后世诊治汗证提供了具体的辨证选方依据,亦对医家培养阴阳为本证治思维具有指导意义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吴勉华,王新月. 中医内科学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2:396.
- [2] 陈言.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[M]. 王咪咪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7:198.
- [3] 张介宾. 景岳全书[M]. 李继明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7:181.
- [4] 姚洁琼,李宜放,张帆,等. 著名医家论治汗证经验评析[J]. 国医论坛,2015,30(3):59-61.
- [5] 王大纶. 婴童类萃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3:195.
- [6] 万全. 幼科发挥[M]. 何永,整理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6:65.
- [7] 李国芳,汪受传. 小儿汗证的古代文献研究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2018,33(5):1932-1934.
- [8] 张欣,关建敏,吴敏,等. 上海地区小儿汗证发病情况及五倍子脐贴疗法的疗效研究[J]. 河北中医药学报,2014,29(2):34-35.

(收稿日期:2019-02-28;编辑:张倩)